

網絡化的宗教

Networking Religion

【美】馬可·泰勒著 張鵬瀚譯
Mark C. TAYLOR

作者簡介

馬克·泰勒，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主任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ark C. TAYLOR,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Columbia University

Email: mark.c.taylor22@gmail.com

Abstract

This essay pres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in terms of recent theories of Emergent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Religion is a network of symbols, myths, concepts and rituals that both provide meaning and purpose and disrupt every stabilizing structure. To be effective such networks must be integrative, cognitive, volitional, affective dimensions of experience.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chematization, which mediates intuition,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and reason. Religious networks emerge and evolve throug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relationships. For a network to persist, it must provide ways for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o adapt effectively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which are natural, soci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Keywords: Religion, Secularism, Network, Information Theory, Imagination, Emergence, Evolution

我的題目無疑是很冒險的：什麼是宗教？四十年前，很少有人預知這一問題在今天會如此緊迫。按照某種論點，世俗化和現代化總是攜手而行。隨着社會變得更為世俗，社會的宗教向度也隨之衰弱。這一過程被認為是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轉的。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現代化並沒有導致宗教徹底死亡，而是引發了不同版本的、相當保守的宗教在全球範圍內的復活，我將其稱為新基礎主義（neo-foundationalism）而非新原教旨主義（neo-fundamentalism）。我一直不相信世俗化假說，因為它是基於對宗教的有限的、簡化的理解之上的。宗教不僅僅包括那些發生在基督教教堂、猶太教堂、佛教寺廟和清真寺裏進行的活動，它還遍佈整個文化。宗教往往在其最不顯眼的地方最有影響力。通過追踪宗教那通常不被人注意的踪跡，我希望能夠開闢在人文學者、科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交流與調查研究的途徑。

以哲學的、或許甚至是形而上學的術語來說，我所堅信的最基本的東西之一是：存在是關聯性的。換句話說，生存就是被連接在一起（to be is to be connected），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彼此相連。如果真是如此，我們在理解任何事物時，就必須理解它是如何在那些構成它、支撐它的關係網（relational web）或網絡中被放置就位的。一種解釋的視角或能使我們識別這些相互連結，在此，我已轉向於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以及更為重要的“生成性複雜適應網絡”理論（theories of emergent complex adaptive networks）^①。我對技術系統、財政金融系統、教育系統和生物系統的研究，使我推斷這樣的諸多系統有一個結構和運作邏輯（operational logic），在整個媒介（media）中

^① 根據網絡韋氏詞典（<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emergent>）emergent一詞具有“作為自然或邏輯的結果而出現”的意思。本文權且將其譯作“生成”。——譯注

是同構的。這就是說，“生成性複雜適應網絡”都是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自然、社會、經濟和文化系統中被建構和運行。這種同構主義是相互作用之可能性的條件，也因此使得從多學科視角來接近這樣的系統和網絡變得必要。

本文希望將論述從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延伸到文化系統和網絡。在最低限度上，任何對宗教的充分解釋都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 描述並/或說明宗教的複雜起源、運作邏輯和多重功能；
2. 釐清不同宗教網絡的出現、發展和轉變的動力學；
3. 說明宗教之間如何關聯、互動，以及它們與生活中的物質、生物、社會和經濟各方面如何關聯、互動；
4. 包含一個“內部”批評的“原則”，使得理論可以無止盡地被修正。

下面這個定義就是為了滿足以上要求而製定的：

宗教是一種生成性複雜適應網絡，這一網絡包含象徵、神話和儀式。一方面，它認定賦予生活意義與目的的各種方式中的情感、思想和行動圖表；另一方面瓦解、錯位和損毀每一個趨向穩定的結構。^①

在一開始強調這一點很重要——這個關於宗教的定義認定了兩種相互關聯的時刻：一個建構並穩定化，另一個解構並去穩定化。這兩個時刻在一種類似辯證（quasi-dialectical）的節奏中不可分離、相互交替。伴隨着不斷加劇的心理、社會和政治解體和紊亂（disruption），信徒們傾向於絕對化、具體化（reify）或偶像化

^① Don Cupitt, *After God: The Future Of Relig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12.

(fetishize) 他們的信仰和實踐。如此宗教就會發展成為 (devolve into) 一種通過守舊來抵禦新事物的過度虔誠。但這樣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會失敗；戰壕挖的越深，就越可能變成這種過度虔誠最初試圖避免的那種解體和紊亂。其實，這種解體不會只有負面消極作用，它還為創造性的、生產性的改變提供了契機。任何宗教理論，如果只專注於兩個時刻中的一個而排斥了另一個，都不能令人滿意。值得注意的是，我並不認為這樣的解釋僅限於宗教的象徵網絡；確切地說，它能夠用來解釋象徵網絡在生活中其他領域的作用方式。通過指出這些脈絡聯繫，我們就有可能在其他人只看到差異的地方識別出相似之處。

為了着手闡明這一宗教定義的條理，很必要考慮一下被我稱作圖式 (schemata) 的東西，考慮一下它的意義和運作。我是向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默裏·蓋爾曼 (Murray Gell-Mann) 借來這一概念的。他認為：“在複雜適應系統^①中，有關環境的信息……並不只是列在計算機科學家們所謂的查找表上。相反，經驗的各種規律 (regularities of the experience) 作為一個模型，或一種理論，或一個圖式以高度壓縮的形式被封裝起來。這樣的一個圖式通常很相似，有時會出錯，但是如果它能夠作出包含解釋和推理的有用預測，能夠概況與之前遭遇的情況大不相同的情境，它就具有適應性。”圖式使得複雜適應系統能夠實現

^① 複雜適應系統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 理論認為系統演化的動力本質上來源於系統內部，微觀主體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觀的複雜性現象，其研究思路着眼於系統內在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以它採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線；其研究深度不限於對客觀事物的描述，而是更着重於揭示客觀事物構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歷程。與複雜適應系統思考問題的獨特思路相對應，其研究問題的方法與傳統方法也有不同之處，是定性判斷與定量計算相結合，微觀分析與宏觀綜合相結合，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結合，科學推理與哲學思辨相結合。複雜適應系統建模方法的核心是通過在局部細節模型與全局模型間的循環反饋和校正，來研究局部細節變化如何突現出整體的全局行為，其模型組成一般是基於大量參數的適應性主體，其主要手段和思路是正反饋和適應，其認為環境是演化的，主體應主動從環境中學習。正是由於以上這些特點，CAS理論具有了其它理論所沒有的、更具特色的新功能，提供了模擬生態、社會、經濟、管理、軍事等複雜系統的巨大潛力。參見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drvbpmzhAyfd2CB_gyg923FiHH7Djub-tuVzzanlsWlBeE73h6TTPXS8JIzkAjfUgh31a4hmrVxFipA_jMya。——譯注

五種關鍵功能。第一，這種系統必須能識別出它所在環境中的規律。每個系統都深嵌在多重網絡之中，這網絡提供了必須被處理的數據流（streams of data）。為了有效地發揮功能，一個系統必須能夠在周邊的流（flows）中識別出規律、樣式（patterns）和冗餘（redundancies）。第二，一旦一個規律被識別出來，系統就必須生成一些圖式，使得系統能夠在這種圖式重現時將其認出。為了良好地運轉，一個圖式必須壓縮盡可能多的數據。第三，複雜適應系統中的圖式必須能夠根據變化的情境來自我修正。第四，不能僅僅是回應性的，而是必須能夠被用來預測周邊的諸多活動，以便及時指導回應行動。一種圖式的有效性是一種描述精準的功能，能可靠預測環境中的相關事件，而且其所製定的行動也會有效力。最後，同一個系統中的不同圖式和不同系統中的圖式必須能夠有效地與其他圖式競爭。那些被證明最能夠適應環境的圖式能夠留存下來，而其它的圖式最終會消失。

比較古代的宇宙演化神話（ancient cosmogonic myths）和現代信息論（modern information theory）這兩個看似無關的東西有助於闡明圖式的運作。很多宗教傳統中的創世敘述都以不同的方式描述着一個共同的起源神話：宇宙誕生於諸多秩序與混亂原則的相互作用。這一爭鬥反映為善神與惡神之間的衝突，而不同的傳統中的善惡之神的特徵各不相同。在西方是古老的巴比倫史詩所描述的馬杜克^①（Marduk）和海怪提亞瑪特^②（Tiamat）之間的戰爭，《創世紀》的

^① 馬杜克，希伯來語名字為米羅達（Merodach），巴比倫城的守護神。馬爾杜克是水、正義、魔法的化身，為萬物的創造者，創造了星系和十二星座符號，有復活死人的能力，以利都的創造神，被尊稱為“彼勒（Bel）”，意為“主”，相當於巴力的尊稱。在蘇美爾宗教諸神中原無崇高地位，原為風暴神和生育神。巴比倫在政治上崛起以後，成為衆神之父。引自：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DZ4auG123zpKhXe585Zr_pcgdqirLakQjrYUdjNOhxnNskwzcw6DF0_G_rsRK6qPjHFv2-GOnfXEJwgssWAMq——譯注

^② 在美索布達米亞宗教（蘇美爾人、亞述人、阿卡德人和巴比倫人）中，提亞瑪特是混沌以及原初創造的象徵，被描述成一個女人，代表陰性之美。她還是原初的海洋女神。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amat>。——譯注

開篇重複了這個故事：“水”和“言”各自對應了混沌（無形）和秩序（有形）。上帝通過話語塑造萬物，從混亂中生成了秩序，於是宇宙出現。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敘述最有影響力的版本之一。造物主（Demiurge）將永恆的形式和總是變化不定的無形的物質結合起來，創造出我們所知的世界。圖式就像柏拉圖的形式（Platonic forms），既是認識論的，又是本體論的。也即，它們既關乎知識，又關乎存在。然而，一方面是諸多複雜適應系統中的圖式和數據流之結構和運作邏輯，另一方面是古代神學和哲學起源神話中的形式和物質，這兩方面之間有着四個重要的差別。圖式之間不是相互獨立，而是相互關聯並且相互建構的。因此圖式並不像形式那樣會永恆不變，而是會隨時間產生和發展。後文將詳述這些要點。此外，與宇宙演化神話中的混沌或初始物質不同，數據流並不完全是未分化的，而是懷有潛在的關係與模式。換句話說，事物的秩序並非是由外界所強加，而是生成於世界的流動與變化中。最後，有序與無序並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而是以一種無法分離的方式相互依賴。

宇宙演化神話中的秩序與混沌之間的關係，還能夠從信息論的信息與噪音之間相互作用這一意義上來理解。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和沃倫·威沃（Warren Weaver）在他們開創性的著作《一種數學的信息理論》（*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formation*）^①中指出，在嚴格的術語意義上，信息與概率呈反比：某事越有可能，它能傳達的信息越少。格列高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闡明信息的概念時如是說：“信息是一種造成影響的差異。”^② 信息必須以充分的差異來表達某種新事物，但也不能差異太大，不能讓其完全不能

^① Claude Shannon & Warren Weaver,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formation*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② Gregory Bateson, "Form, Substance, and Difference,"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Inc., 1987), 460.

被識別和發覺。因此，信息的領域處於太少差異與太多差異之間。一方面，信息就是（is）差異，因此缺乏差異意味着沒有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又是造成影響（make a difference）的差異。並不是所有的差異都能夠造成影響，因為這些信息是冗餘的，因而作用不大。由於在噪音中會產生過少或過多差異，信息總是生成於混沌兩面的邊沿。模式（pattern）通過差異的方式從噪音中生成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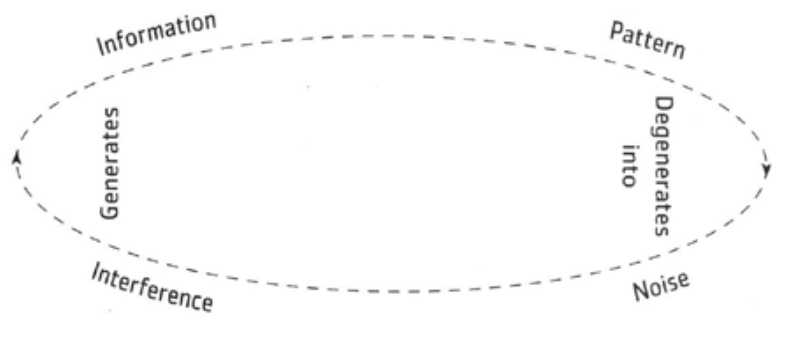


圖1：信息處理

信息和噪音並不只是對立的兩面，而是相互生成（coemerge）且相互依賴（codependent）的：信息是形成過程中的噪音（information is noise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而噪音反過來通過介入信息模式（informative pattern）來中斷（interrupt）。如果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信息使得噪音穩定，而噪音則使得信息脫穩。脫穩的過程並不僅僅是消極的，因為它提供了生成新信息模式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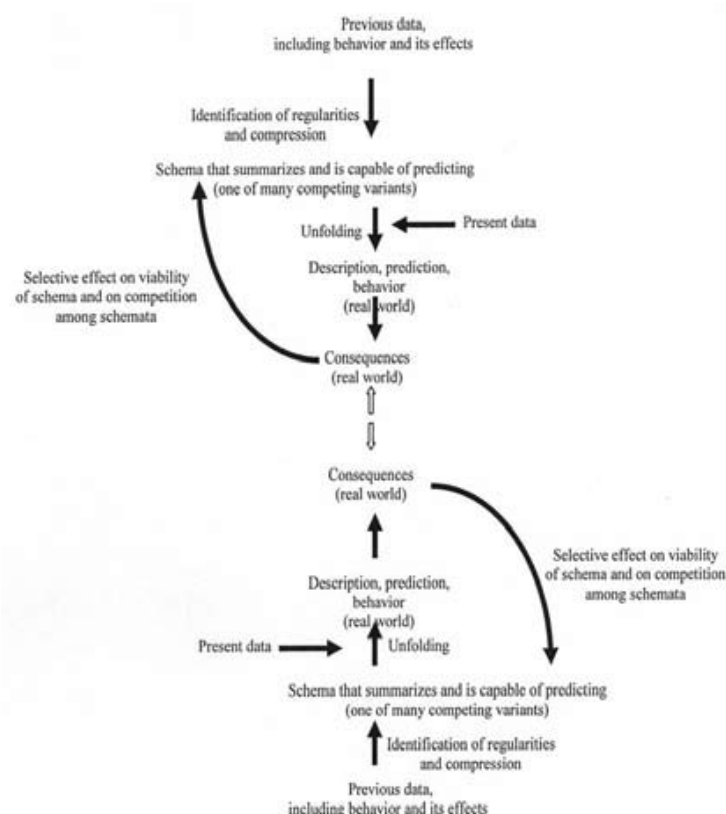


圖2：共適應複雜網絡中的圖式

在理論和實踐中，圖式首先被用來篩選數據，以便探測、構成和重構模式——這些模式同時對實體和事件進行描述、重繪（refigure）和預測；其次，它被用來模擬在現實世界中的適應性行動（adaptive actions）。圖式的可行性取決於他們在理論上的準確性和在實踐中的效力。新的數據可能導致圖式被修改乃至被毀滅。圖式既不產生於先驗的環境，也不產生於後驗的環境，它們產生於一個特定的環境，這一環境奠定了一些約束參數，這些約束參數則是新的理念、實體和事件的條件。圖式一旦生成，就會通過與其他圖式競爭的共同進化過程來持續發展。於是我們會看到，宗教神話和象徵的作用方式與圖式在複雜適應系統中的作用方式一樣。然而，需要認識到的要點是，圖式並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也不一定是特意被建構的。它們並沒有被局限於意識或自我意識的系統中。當圖式被完全部署之後，它們會自我組織並在物理、

化學、生物以及社會、政治和經濟系統中運作。如果沒有圖式來處理信息，免疫系統、市場乃至進化過程自身都將無法運作。

為了理解宗教象徵和神話如何像圖式一樣運作，為生活提供意義和目標，思考它們在認知活動中的角色會很有幫助。我注意到，理論和實踐在圖式中未分離：描述性的表徵（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s）提供了世界的模型（models of the world），這些模型又是世界中的活動之模型（serve as models for activity in the world）。思想與行動構成了一個反饋環路，它們在其中互為條件。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形塑了我們的行動，而我們的行動又重塑我們對世界的解釋。圖式以這樣一種方式處理數據：信息、知識和意義被編織在一起，為思想和行動創造模式；反過來，這些又產生了圖式中的修正和調適。對數據的模式化（patterning）創造出信息，繼而信息又被塑成知識，而知識能夠呈現意義。這個複雜過程導致了不同認知活動之間的協調：直覺、知覺（perception）、意識、自我意識和理性。

這些活動之間的關係及其產物之間都是分層級的，然而又非線性的。每個更高的層級既來自那些較低的層級、又反作用於那些較低的層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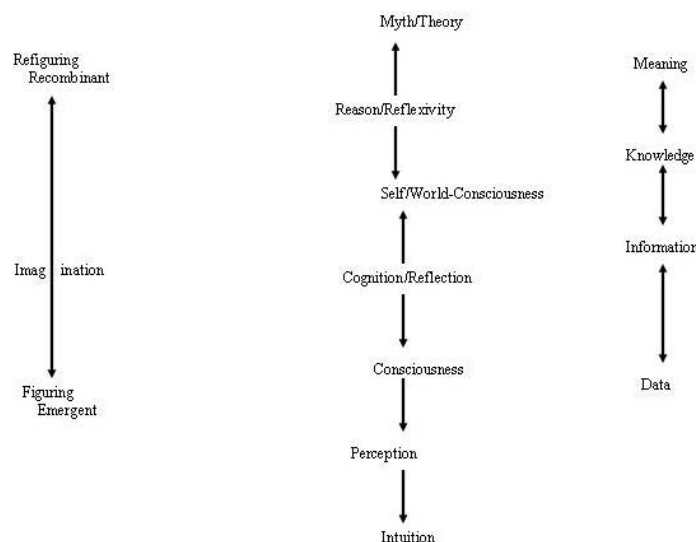


圖3：圖式化過程

通過圖式化的過程，主體和客體、自我和世界都相互生成，也因而相互依賴。給予客體比主體更多的優待（經驗主義或現實主義）或者給予主體比客體更多的優待（哲學唯心主義或建構主義）都是錯誤的。對數據流的直覺是作為感官知覺被我們直覺感受到的，之後它又被塑造成意識的客體。這些客體被拿來放在一起構成物理世界。隨着世界的生成，主體首先有可能變得具有意識，並最終轉回到其自身，進而變得具有自我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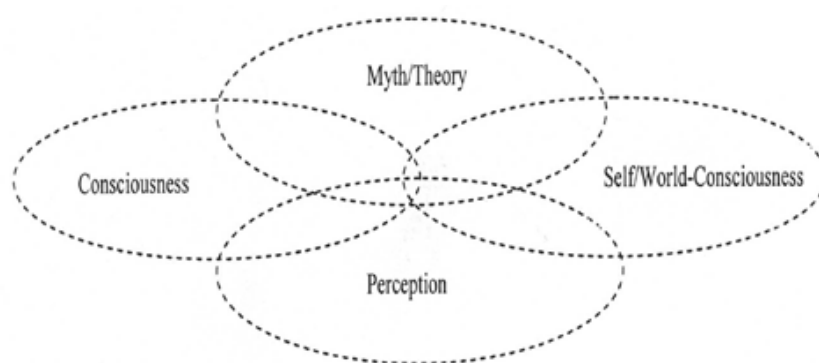


圖4：象徵/認知網絡（1）

自我意識不僅預設了相對於世界的差異化，也同時預設了與世界的關係和與其他自我意識主體（agents）的關係。換句話說，主體性必然是主體間的（intersubjective）。通過在永不完全閉合的奇怪循環中聯結意識和自我意識，理性使得自我反省加倍（double）。自反性結構中的間隙，創造了針對不確定性的開放行為。沒有不確定性，創造性就是不可能的，未來也會被封閉。在圖式化的最高層級，象徵和神話將感覺經驗、信息和知識整合進模式，而模式則提供意義和目的。由於這些層級和運作之間的關係是同時的而非相繼的，不同的認知運作（cognitive operations）互為條件。世界通過特定的形象、概念和象徵被組織起來，這些形象、概念和象徵則生成於經驗的數據中、隨着經驗的數據而改變，同時又形塑着經驗的數據。這些運作的非線性創造了一個相互作用的認知網絡。甚至在這個微觀層級，認知

網絡的結構和運作邏輯也和複雜適應系統的結構和運作邏輯相一致。不斷增生的連接（connections）導致了諸多調適（adaptations），而調適又導致了新的連接，而新的連接又導致進一步的調適。

在認知網絡的每個層級中，不同的圖式以一種相似的方式發揮作用。想像的功能之一是協調其他的認知活動。為了理解物理、化學、生物、社會以及經濟諸系統如何像信息處理那樣發揮作用，就有必要更多了解信息這個概念。同理，為了領會想像是如何通過認知網絡而工作的，拓展對想像的理解也非常必要。想像通過形象化（figuring）活動知會（inform）認知（不一定是意識）。在英語中，figure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如果我們注意到figure這個英文詞的多重意義和細微差別，就可以把想像理解為使形象（figures）生成的形象化（figuring）活動。這些形象（figures）就是使經驗數據能夠被描摹或形象化（figured）——也即被構成（form）和被計算（calculate）——的圖式。圖式和想像的共同作用創造了複雜的信息處理網絡。當數據變化以及模式彼此競爭地相互作用時，圖式就通過再描摹或再形象化（refiguring）反覆進行自我調整。因此，想像活動包含兩個方面：生成性的（即生產的和創造的）形象化（figuring）和重組性的（即再生產的和再創造的）的再形象化（refiguring）。因此，至少在這一點上，創造性具有一種生成性屬性（emergent property），且這一屬性無法被編碼或程式化。

只要每個形象都以形象化過程為前提，作為其自己的一種可能性，每個形象都會包含某種無法被描摹或形象化的東西。換言之，形象“包含”（include）但是不會合併（incorporate）某種既不能被表徵也不能被理解的東西。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形象似乎（as if）總是從內部被損毀（disfigure）。這種損毀並非是一種瑕疵，而是打開形象，也因此是生成性創造力的必要條件。想像的這兩個方面對應着宗教的兩個時刻。在形象建構與穩定之時，形象化則在摧毀、瓦解、打亂和動搖每一個表面上正在穩定的圖式，即便在引發一個新的

圖式化過程（schematization）時也如此。

在對象徵網絡進行更為細緻的考量之前，需要留意一點：認知網絡的非線性性質（non-linearity）質疑任何將宗教絕對地與思維（認知）、行為（意志）或情感（影響）聯繫在一起的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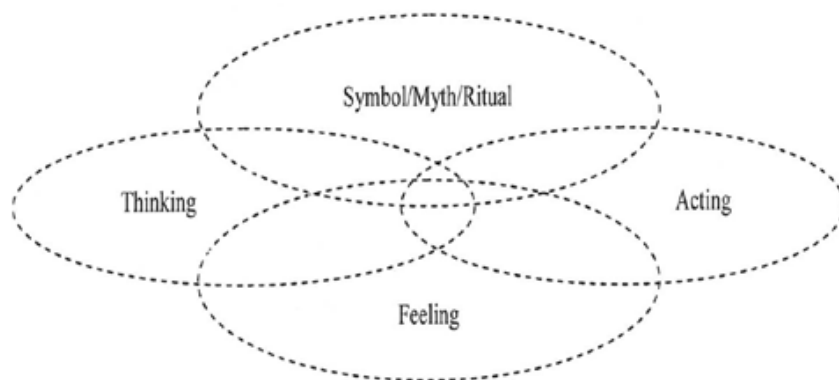


圖5：象徵／認知網絡（2）

從十八世紀到現在，很多宗教的解釋者都曾傾向於集中關注這些能力（faculty）中的一種，不惜忽視另外兩種能力。然而，如果認知網絡是如前所述那般彼此聯絡在一起，那麼不同的能力就不能被分開來考慮，因為它們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感受、思考和行動彼此相互影響；其中一個發生變化，其他的兩個也不可避免地會變更。

象徵、神話和儀式構成了網絡，也被網絡所構成。這種情況又反過來構成了更廣闊的網（webs），也為更廣闊的網所構成。就像不同的圖式通過競爭性相互作用而出現，諸多象徵網絡也在那些關係網中——這些關係網按照複雜適應系統的原則發揮作用——相互生成、共同進化。如果不考慮具體環境，所有複雜適應系統都有如下特徵：

1. 它們由許多相互依賴的部分組成，這些部分以多重且變化的方式相連接。
2. 它們顯示出自發的自我組織性，這發生在為偶然性留下空間的約束參數之內。

3. 由自發的自我組織所導致的結構，從系統中的要素中生成，但並不必然能被還原為系統中的要素。

4. 自我組織結構是開放的，因此能夠適應其他結構、與其他結構共同進化。

5. 隨着連通性增強，網絡變得更加複雜並向不平衡狀態漂移，直到其到達那個發生不連續性階段轉換的轉折點。

既然複雜適應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邏輯，在從所謂的“物質”到“非物質”的媒介範圍內都是同構的，那麼網絡就總是其他網絡的網絡。在不同的術語中，複雜適應系統是分形的（fractal）——它們在每個組織層級和每個操作階段中都顯示出相同的結構。

為了發揮宗教功能，象徵網絡必須回應神學、人類學和宇宙學議題。這三種經驗的維度在上帝（或用更普遍的說法——真實——不論其如何被構想的）、自我和世界或與之相等之物的相互關聯的形象中被表述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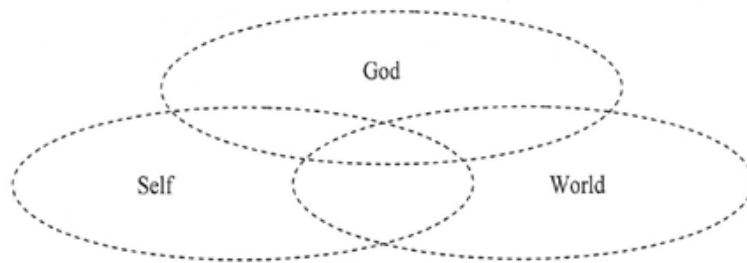


圖6：宗教網絡

神學、人類學和宇宙學互為條件：人們想像上帝或與上帝具有同等功能之物的方式決定了人們設想自我與世界的方式，反之亦然。例如，在有神論的諸多傳統中，人們相信上帝是一個創造和管理世界的具有人格特性（quasi-personal）的存在。在傳統上，這個觀點的參數中已經包含着一個二選一的狀況：要麼上帝的意志服從上帝的理性，這種情況下世界最終是可以理解的；要麼上帝的意志先於

理性，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在根本上就是偶然的，其神秘是不可化約的。與此相應，人類被理解為要麼在本質上是理性的，要麼是被無理性的（irrational）或者準確地說是非理性的（arational）意志、驅動力（drives）和欲望所統攝的。一種特定象徵網絡的其他理念與教義特徵能夠從這三個節點性的概念中得出並用於補充修改，比如善與惡的概念、時間和空間的概念、歷史和自然的概念以及墮落與救贖的概念等等。當宗教被理解為一個複雜適應網絡時，我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些差異鮮明的二選一對子就會顯得複雜——雙方都不能將自己與對方分開，它們既是在對方之中成為自己，又是通過對方成為自己。

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樣，諸多的象徵網絡從來都不是在孤立中被構造的，而是從諸多的複雜關係網之中、之間（within and among）生成的。這些網絡具有共時和歷時兩個軸線，導致了特定象徵網絡之間的相互依賴和共同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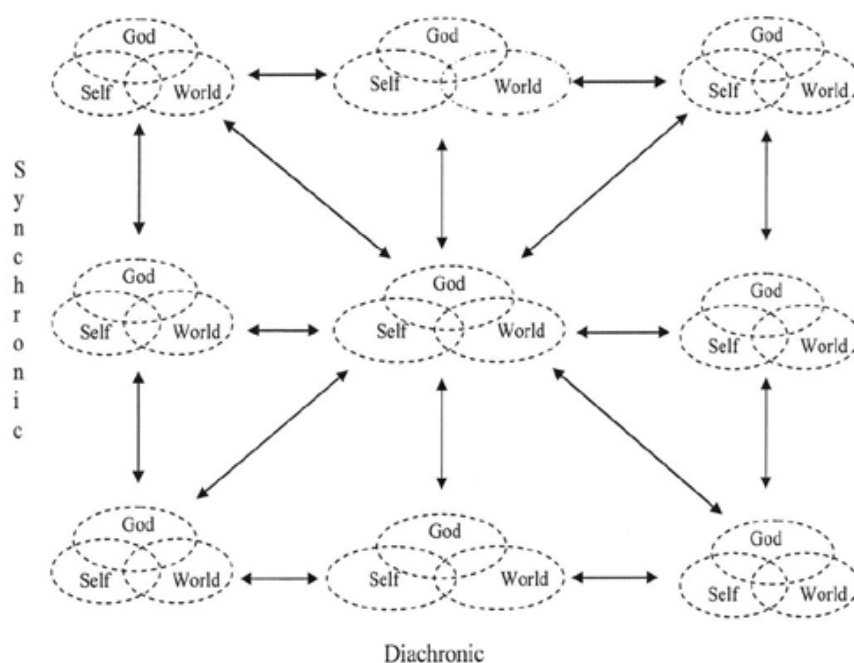


圖7：單個宗教傳統中的象徵網絡之網狀圖

在一個傳統中，任何象徵網絡的特殊性都是一種功能，使其與某一特定時刻（共時軸）其它可供選擇的宗教之間相似又相異。例如，今天的福音派新教教徒定義他們自身的方式，正是強調他們與其他基督教教派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所謂的“世俗人文主義者”之間的對立。除此之外，每個宗教立場都是暫時而且歷史性的——它從那個塑造它的過去之中生長出來，它預期着那個能夠改變它的將來（歷時軸）。

“相同”的傳統有着相互牴觸的諸多版本，這些版本之間無休止地相互作用。正是這些相互作用導致了持續的修正和反覆的革新。因而我們應當理解，歷時既不是簡單線性的，也非簡單循環的。

就像在一個特定傳統中沒有一個版本能夠脫離其他版本而獨自生成，每一個宗教傳統都是由它與其他宗教傳統的相互作用構成的。不同的傳統提供了差異鮮明的象徵網絡，這就為描繪意義和目的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圖式。這些圖表中的多重矢量表明：在這些網中相互牴觸的象徵網絡是相互連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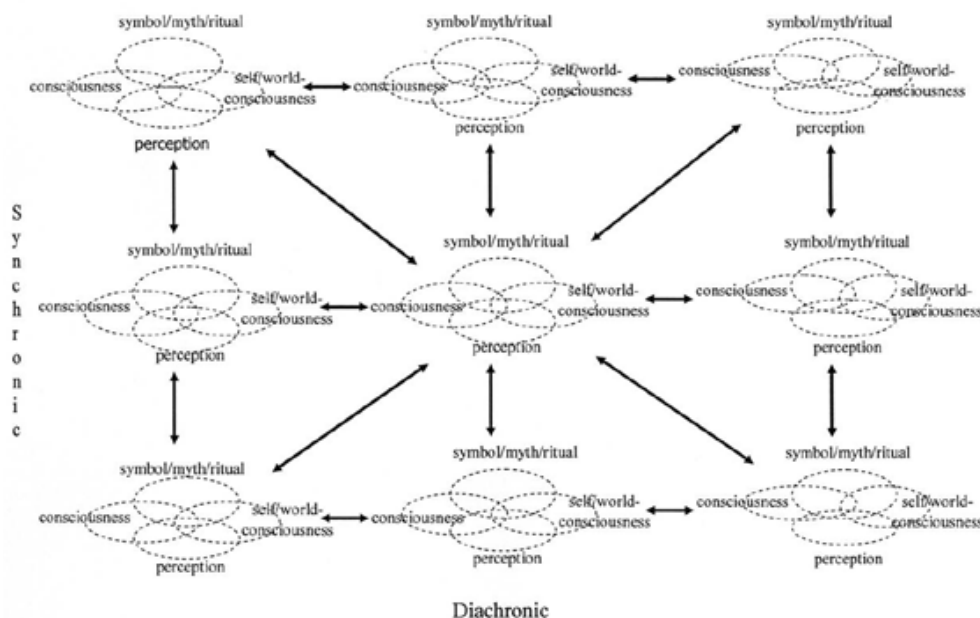


圖8：多重宗教傳統中的象徵網絡之網狀圖

多個傳統之間的動力學（dynamics）與單個傳統之中的動力學是相同的。隨着彼此競爭的圖式之間的相互關係不斷增長，特定傳統之間的穩定性以及連接它們的網絡會衰減。這些發展會使得活力和不安全性持續增長，對此有三種比較明顯的反應：保守派、進步派和改革派。

宗教傳統和文化機構會試圖最大程度抵禦變化。保守派堅持舊的事物，抗拒新的事物。當然，從傳統主義者到極端反對派之間的抵抗程度會不同。在社會發生變化之時，很多人通過傳統的信仰和實踐來尋求安全與穩定。隨着變化頻率上升，會出現更為激進的反應。忠實的信徒們通過構建一個理想的過去將自己與無信仰者區別開來，並相信那個理想的過去如今已經毀壞了。他們的目標就是恢復這個過去，而方法則是以轉變或清除不信仰者的方式來淨化當下。投身於這個反對變革計劃的人會傾向於推廣不容置疑的基要信仰原則。宗教的反變革者們會給出最清楚的虔誠事例，將一個生成複雜象徵網絡的某個特定版本具體化和偶像化，把相對的東西絕對化。

然而，對很多信徒來說，反變革派的回應方式不僅會起到反作用，而且事實上還很危險。在一個複雜且不斷變化的世界中，過於簡化和僵硬的信仰會帶來暴力乃至破壞的威脅。為了避免災難，那些批評反變革基要主義者的進步批評者們建議，針對變化的境況對信仰和實踐做一些選擇性調適。不同的團體所促成的改變，在性質、範圍和比率上會有差異，他們也由此獲得了特定的身分認同。不論時期或環境，有些信徒明白如果傳統和系統想要繼續存在，就必須改變，這樣的信徒是自由主義者或現代主義者。對於保守派、傳統主義者和反變革派來說，那些主動承認自己甘願修改信仰以適應當前境況的信徒，正好為道德衰敗提供了進一步證據，這讓他們怒火中燒。

在諸如我們這樣有着極大不穩定性的時代，遞增的變化不會永遠繼續下去。隨着網絡在世界範圍內擴展，相互競爭的觀點彼此衝撞並創造出噪音。噪音不斷擴大，直到網絡——圖式在其中被構成——

達到那被複雜理論家（complexity theorist）^① 描述為“自我組織的臨界狀態（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或者用一個更為通俗的習語來說：轉折點。複雜系統中的自我組織臨界狀態由非線性動力學所支配。作為這一非線性特徵的結果，特定的事件通過正反饋循環被放大，並且能夠具有與它們的起因不成比例的效果。例如，考慮一下，突尼西亞一個個人的自我犧牲引發了阿拉伯之春。為了看到不同複雜網絡之間的在結構上和功能上的相同點，可以比較地看看一個流氓交易員（rogue trader）^② 的行為或是單個銀行的破產是如何使得災難性後果向整個全球金融網絡傾瀉的。在這些案例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案例中，網絡中個體要素之間動力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全球性事件。全球性事件要求一種全盤的描繪，這是不能被還原為對個體要素的論述的。當一個網絡到達了轉折點，個體要素的效果就變得不可預測。雖然可能知道在某個時刻會有意義重大的變化或者階段的轉變發生，但卻不可能預知哪一個事件會傾覆平衡並顛覆均衡。

由於世界中的諸多情況變化得比描繪它們的圖式更快，我們已有的地圖不再適合我們必須航行的區域；因此，確定方向（orientation）變得越來越難。缺少了熟悉的路標和可靠的向導，意義和目的變得昏暗模糊。遞增的變化最終讓位於系統性的轉換，在其中新的圖式從競爭和舊形象、舊形式的組合遊戲中脫穎而出。通過那些動亂不定的、不能很好適應不斷變化之境況的結構，描繪活動創造為更有效的圖式和象徵網絡的進化——更準確地說是共同進化——創造了條件。圖式和網絡在

^① 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是對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的研究。A complex system is a damped, driven system (for example, a harmonic oscillator) whose total energy exceeds the threshold for it to perform according to classical mechanics but does not reach the threshold for the system to exhibit properties according to chaos theory. 一個複雜系統是一個衰減的、被動地系統（比如，一個諧振子）。如果它的總能量超出臨界值，其表現就符合經典力學；如果總能量沒有達到臨界值，就顯示出符合混沌理論的特性。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lex_system。——譯注

^② 流氓交易員是西方金融市場中，在未經授權情況下代表機構進行交易的交易員。——譯注

迅速變化環境中的成功進化以下列能力為條件：

1. 能夠適應不斷增加的相互連接，因此也能夠適應不斷增長的複雜性。
2. 能有效管控不斷增加的波動性和不穩定性。
3. 能夠保持開放和適應性。
4. 能夠迅速且有效地變化。

進化——不論是在生物的還是宗教的意義上——都不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具有生物學家口中的間斷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特徵。相對穩定的、漸變的時期被階段轉換打斷，階段轉換導致結構和形態學上的轉變。既然發展是間斷的而非持續的，改變就是不定時且不可預測的。在彼此連接的網絡的共同進化（coevolutionary）框架中，瓦解既是破壞性的也是創造性的。不論進化在何種媒介中發生，建構總是伴隨着解構，正如解構總是伴隨着建構。一旦相互聯結，新的配置會不可避免地 toward 混沌的邊緣漂移，在那裏過程會重複自身。如果按照這一方式理解，象徵、神話和儀式的生成性複雜適應網絡的運作就參與了信息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形象改變了組織性的模式。正如前文所言，這樣的形象化擴展了想像活動，使它超越了人類精神的界限，成為體現在自然和歷史之中的變化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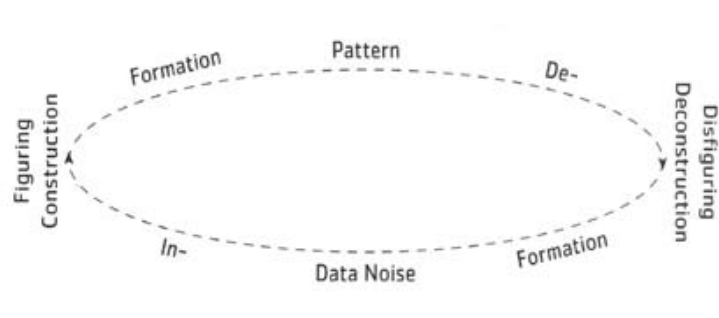


圖9：想像

一如信息生成於構造中的噪音，所以形象化（figuring）和去形象化（disfiguring）導致並持續地使形象和模式發生轉變，而形象和

模式在生活缺少安全基礎時為之提供不斷變化的意義和目的。為了領會這一洞見的深遠涵義，有必要進一步擴展宗教象徵、神話和儀式深嵌其中的諸多關係網。我們已經在單個宗教傳統內部以及多個宗教傳統之間追踪了圖式和象徵網絡的生成過程，現在有必要考查它們與更廣泛的文化、社會和自然模式之間的關係。

如前所述，生成性複雜適應網絡並不限於文化，還可以在構成日常世界的整個自然和社會系統中發現它們。換句話說，它們不僅僅是主體和認識論的，也是客體和本體論的。我相信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生成性複雜適應網絡，它包含諸多重要的宗教向度、倫理規範和政治要事（political imperatives）。在當下的環境中需要記住，各種網絡在自然、社會和文化的諸系統中有着相同的結構和運作邏輯。此外，自然、社會和文化的相互關係與共同進化也同樣被生成性複雜適應網絡所管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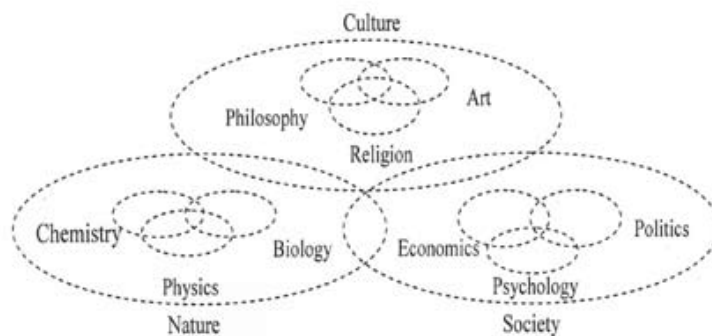


圖10：自然、文化和社會的相互依賴關係

在此，整體和部分是同構的；再次強調一下，相互聯繫的網絡顯示出一種分形設計。網絡是從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繫之中生成的網絡之網。作為網絡的非線性動力學的結果，自然、社會和文化互為條件並共同決定彼此。例如，文化決定自然，正如自然決定文化。

為了完成這個已然很複雜的圖畫，必須加入一個最終的因素：技術。技術的發展既是生發於自然、社會和文化系統中，同時也反作用於自然、社會和文化系統。當然，技術並不限於人類世界，它可以擴展到

動物界，甚至可以超延伸至更簡單的、被稱為“更低級”的生命形式。在人類領域內，生產與再生產從機械形式轉換到電子形式，這標誌着一個轉折點，它深刻地轉變了技術與自然、社會和文化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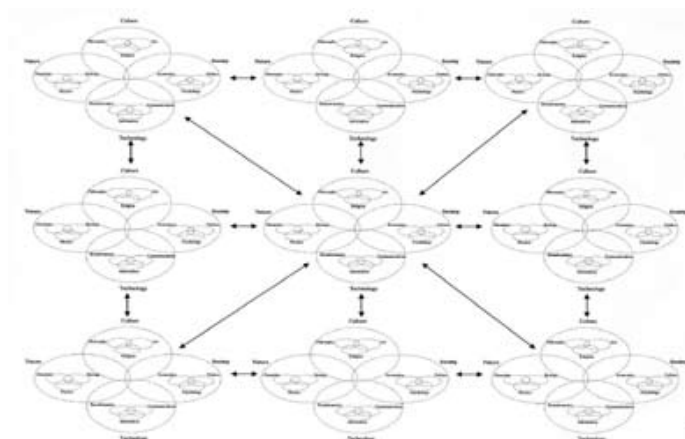


圖11：全球網絡的共同進化

如果自然、社會和文化過程在效果上還是分散的過程，那麼數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就正在創造這樣的技術：它們的結構和功能不僅反映世界上已經在發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還增強和轉變世界上已經發生的事情。當信息機器被接入諸多網絡中——這些網絡有着與自然、社會和文化系統相同的結構，共同進化就變得不可避免，即使它的方向（direction）並非如此。這一發展進一步模糊了自然和文化或自然和人造系統之間的界限。隨着信息和生物過程的相互聯繫日益密切，生命本身將會改變，自然、社會和文化的相互關係也會被徹底重新配置。

這些洞見與發展顯然對於宗教和其他文化現象的研究有着重要意義。如果現實世界是一個關係網絡，它就不能經由那些概念網格（conceptual grids）來被理解，因為概念網格創造的是差異和對立而非聯繫和連接。為使知識成為可能，認知的結構和發展必須與被研究現象的結構和發展保持一致。如果精神是以一種方式聯絡，而世界以另一種方式連接，那麼這樣的世界就是不可知的。

然而如我們所見，主體/客體、自我/世界以及精神/現象都並非

對立，而是在共享的網絡中相互生成且共同進化。因此，認知過程通過那些不斷在重新配置的遞歸反饋循環（recursive feedback loops）與客體和事件糾纏在一起。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創造出更大複雜性的相互關係，也構成了我們所有知識之可靠性的條件。

隨着知識的進化，對課程、大學以及學術職業的組織也必須轉變。專注化和專業化是必要的，但這並不足以理解當今世界的諸多複雜性。創造性的洞見生成於邊緣——在既有規則的間隙之中。就像宗教系統一樣，學術學科也在盡可能長久地抵抗變化。一如地圖與領土或版圖的意義開始有差異^①，學科最後也到了轉折點，必須重新劃定考察的界限。隨着過度專業化的局限變得不可否認，一個階段性轉換正在開始發生。為了追蹤這一正在生成的軌道，有必要從不同的視角接近宗教，不僅要把它置於不同宗教傳統的環境中，還要把它置於其他文化系統（也即，哲學、藝術、音樂、戲劇、舞蹈，等等）、社會系統（經濟、政治、心理，等等）和自然系統（也即，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和神經學的）之中。這些系統是相互依賴的，一個不能被還原為另一個，因此每一種形式的還原基礎主義都是不合理的。如果不理解自然、社會、心理或文化過程是如何相互關聯的，那麼也不會對它們各自有充分的理解。這將要求跨越學科邊界的交流與合作，而這一點在今天的研究型大學中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為此，我希望我們業已開始的對話會是在這個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

譯者簡介

張鵬瀚，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ZHANG Penghan,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① 此言出自波蘭裔美國哲學家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名言“地圖不是領土”（Maps are not territories.）。——譯注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Bateson, Gregory. "Form, Substance, and Difference."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Inc., 1987.

Cupitt, Don. *After God: The Future Of Relig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Shannon, Claude, Warren Weaver.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formation*.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